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汪小英 译

洪宇 校

# 在希望 与历史之间



Nadine

Gordimer

漓江出版社

(南非) 纳丁·戈迪默 著

汪小英 译

洪宇 校

# 在希望 与历史之间



漓江出版社

桂林

LIVING IN HOPE AND HISTORY

by Nadine Gordimer

Copyright: © 1999 by Felix Licensing BV

through Big Apple,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5-134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希望与历史之间/(南非)戈迪默(Gordimer, N.)著;汪小英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6.4

(纳丁·戈迪默作品系列)

书名原文: Living in Hope and History

ISBN 978-7-5407-7690-9

I. ①在… II. ①戈… ②汪… III. ①随笔—作品集—南非(阿扎尼亚)—现代  
IV. ①I47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2709 号

出版统筹:吴晓妮

责任编辑:周向荣

内文排版:钟 玲

封面设计:李诗彤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7.5 字数:150 千字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3.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Contents*

目 录

作家应当做到:说不可言说之事,问难以回答之问题。

——萨尔曼·拉什迪

三人同床:虚构、道德与政治 / 3

今日世界作家的地位:哪个世界? 谁的世界? / 16

新篇章:非洲作家与 21 世纪 / 29

参照:文化的符号 / 36

狮子、公牛与树 / 48

君特·格拉斯 / 54

将晚的谈话 / 57

约瑟夫·罗特:帝国与流放的迷宫 / 66

交谈:大江健三郎与纳丁·戈迪默 / 81

我们应如何看彼此？

——蒙加纳·瓦利·塞若特

1959：种族隔离是什么？ / 101

如何不去了解非洲人 / 110

图书馆的上午：1975 / 116

英雄与坏人 / 120

勇往直前：前途在你手中 / 123

我们应如何看彼此？ / 132

1989年10月29日——美好的一天，同志 / 139

曼德拉：他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 143

第一次 / 147

第二幕：一年以后 / 152

重要文献 / 162

正如别人看我们 / 165

在沃土上辛勤耕耘 / 170

永不止息。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作家的想象力与国家的想象力 / 183

写作与存在 / 187

生活在一片没有疆界的土地上：文化全球化 / 199

我们的世纪 / 206

作家应当做到：说不可言说之事，问难以回答之问题。

——萨尔曼·拉什迪



## 三人同床： 虚构、道德与政治

三人同床，是一件扭曲的情事。床上这三位，我还是交代一下为妙。

对于政治和道德这两个已有概念，无须多作解释，不过二者间的关系十分暧昧。而对于虚构所界定的责任，我会在后文持续提出质疑。所以，先从词典对虚构的基本释义开始吧。

《牛津英语词典》指明：“虚构是指营造或创造出想象中的存在、事件、状态……包括创作小说和故事。”如此这般，按照词典的解释，诗歌并不属于虚构。我越深入思索，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诗人不会营造出想象中的存在、事件与状态吗？

如果让学者或文学家举例，说明诗人创造想象的存在和事件的能力，诗人唤起事物状态的无与伦比的能力，他们会说这和散文家的作品一样，这种创造完全取自于生活的事实，如同精灵伴随着烟雾从瓶子里冒出来。这样的事例，简直不胜枚举。假如虚构是幻想的超现实的精灵，那么诗歌则是彻底的虚构。我这里所说的虚构，也包括了诗歌。

政治与虚构为什么会同床？自从人脑神奇的想象力不断提升，道德就与叙事手段同床。我对于大脑进化的科学解释知之甚少，但是，我相信生命的真理可能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初期。变化的想象力创造出“事物的状态”，将之分类排序。在这种排序中，对于与同类、动物和自然共存的生存的严酷，我们或有所悟。这种想象力充分发展之后，伟大的虚构艺术便在富于想象的发现中进化，用于阐明今后年代的危机，而这在写作之时是不曾预料的。如今，《白鲸》<sup>1</sup>已经被视为环境悲剧的寓言。“‘白鲸’代表着宇宙的惩罚”<sup>2</sup>：我们设法摧毁这代表大自然的奇妙动物，相信我们只有战胜自然才能存活；现在，我们在自然的死亡中看到自身的死亡，而这一切是我们自己导致的。

不过，想象力的第一个成果当然是宗教。从神（想象力拥有何等的壮举！）那里凭空建构出神圣的秩序，产生出世俗的、切实的道德秩序，这样人类才得以共同生活，并与其他物种和平共处。

“道德”是“虚构”的丈夫或妻子。而政治呢？政治大概尾随着道德，撬了门锁，解除了警报，溜了进来。开始，也许是浑然不觉，政治搂着虚构，而虚构觉得搂着它的是道德，没有觉出有什么异样……这也难怪。道德和政治有血缘关系。政治的鼻祖就是道德，人们早把这事儿忘记了。二者渐行渐远。如果虚构接纳了被单下的第三者，待到晨光乍现，它立即就会彻底看

---

1 《白鲸》(Moby-Dike)，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发表于1851年的长篇小说。——编注

2 哈里·莱文(Harry Levin):《黑暗的力量》(The Power of Blackness, Vintage Books, 1960)之“约拿情结”，第215页。(本书注释中，未作说明的皆为作者原注。)

清政治究竟是何许人等。

我不会把这个寓言说得太长,只需要延长到下一代。奇怪的情事产生出两个子嗣——服从和承担责任。你不难猜出它们各自的父亲是谁。

直到1988年,我都在强调:可能长久以来,小说创作饱受某一宗教或世俗道德强制的压力,而现代作家完全可以安然置之,不予理睬。梵蒂冈仍然保有它的禁书清单,但是在大多数国家中,自由表达已经得到公认,宗教也是如此(也许北美的某些学校例外)。

亵渎神明?这种古怪的禁忌已经过时,如同一个四字母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之间出现的连字符。东欧、苏联和南非严格执行着审查制度。例如,审查官员关心的是所谓具有政治颠覆性的文字,而不是冒犯或反对(在苏联,这些宗教情感是完全看不出来的)。甚至在南非也是这样,加尔文式严厉的荷兰改良教会把宗教与种族主义捆绑在一起,并且支持教会维护国家安全以及建立在所谓种族“纯洁性”上的性道德。1988年,也就是十年之前,一位南非演员在世俗场景的舞台上大呼“我的上帝!”而遭到指责;《耶稣基督万世巨星》被禁。到了1989年,对教会及其道德的那些肆意嘲笑,人们却视而不见,而电影中那些放纵的性生活和正面全裸的镜头,也不会被检察官剪掉。

可是,我抱着在宗教和性道德上自由表达的幻想,却忽视了伊斯兰教对犹太—基督乃至无神论世界——这一世界拒绝遵从被伊斯兰教视为神圣的宗教禁忌——的谴责。而伊斯兰教是对

的,我应当知道,这种审查不会演变为宽容,它不会像非伊斯兰国家那样,允许其人民有不信的自由,相反,它只会成为煽起宗教狂热的一阵狂风。于是,一场针对《撒旦的诗篇》的圣战开始了——敌人仅仅是一部小说,一位作家,伊斯兰世界的金钱和力量都用在了剿灭萨尔曼·拉什迪的“法特瓦”<sup>1</sup>上。

现在,情况又回到了从前:宗教间的迫害——对人们信仰自由的权利的剥夺——早已被推翻,而宗教开始迫害自由——不只是表达的自由,还有作家行动的自由,以及他的生命权。我和其他作家对此无比震惊。在这个崭新的年代,自由在兴起,我们看到,一位作家当了一国的总统,而另一位作家却在全世界被追杀。我们看到宗教通过它的信众在方方面面制造恐怖的力量。被压迫的政治难民可以在他处避难,萨尔曼·拉什迪却无处可去。伊斯兰世界的死亡判决使各地的恐怖分子拥有处决权,越过了任何国家的法律。

人们可能已经忘记前弗洛伊德时期的伪善和清教徒式的严厉。拉什迪的恐怖遭遇如同一只手重重地落在虚构的肩上:写作要服从于某种道德的压力,遭到恶意复仇追杀的威胁仍会降临,即使大多数作家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在假设道德应当与虚构离婚?虚构应当不负任何道德责任?不是这样。虚构的责任在于行使自由,以无畏的诚实探索和省视当代道德——包括诸如宗教在内的道德系统。

这不是一种轻松的关系,无论是萨尔曼·拉什迪的极端经

---

1 法特瓦(fatwa),指伊斯兰宗教领袖的裁决。——译者注

历,还是古斯塔夫·福楼拜的经历。在《包法利夫人》被控有伤风化的案子中,福楼拜赢了。在之后的1857年,他这样评论这一案件对虚构的意义:虚假的文学价值观的建立,真实的文学价值观的折损。“我的书会卖得特别好,但是我一想到审判就很生气,它转移了对于小说的艺术成就的关注……这些吵闹让我无语,我希望再也不出书,永远不被谈起。”<sup>1</sup>

虚构与政治的关系不是夫权或父权的统治,而源自宗教的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却往往这样。就我所知,没有哪位批评家曾表示针对“有伤风化”的道德导向在虚构中没有地位,而在很多虚构作品中,作者将政治如同性或者宗教一样视作人物的主要动机,却导致这些作品被宣布为“受到败坏”之作。当然,这种惩戒的缺失在婚外恋情里是典型的,一场风流韵事让紧张情势升级:悦纳和厌恶相继、悲伤和庆祝交替、忠诚与背叛颠倒,指责此起彼伏。小说创作者是否违背其置身事外的作者立场,而出于公民参与的内在信念自愿干涉政治,或是否由于外在的压力或吸引而做出干涉,这些关系中会出现同样的问题,需要在虚构中得到解决,像在实际生活中一样。

何时作家能不处于政治冲突之中?黄金时代、美丽新纪元、咆哮的20年代,这些可爱的年代又属于谁?

在奴隶和农民的悲苦之中,雕塑家雕刻出完美匀称的躯体,这样的年代又是谁的?沙皇亚历山大狱中的革命者的时代、尼

---

1 《古斯塔夫·福楼拜书信集1830—1857》, (*Letters of Gustave Flaubert 1830—1857*, Belknap Press, Harvard, 1990), 第224页。

斯的公爵建造宫殿的年代；饥饿与失业使法西斯主义膨胀，而花花公子与淑女们在粉红的香槟酒杯中跳舞，这样的年代又是谁的？

作家什么时候可以公然或悄然逃离政治？有些作家视虚构为纯粹的语言探索，如同音乐是纯粹声音的探索，达达主义的喋喋不休和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的长篇大论都指向他们所反对的事物，体现着深受政治影响的时代精神。这些文学运动不论多么荒诞，都体现出对于政治与虚构的认知。

似乎不可能逃离这种关系。一方面，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如希默斯·希尼所说，在这个世界里，“心血来潮的幻想至高被看成奢侈或放荡，至低是异端或者不忠。在理想国，人们通常期望作家放弃他或她的冒失以及潜在的破坏可能，转而维护正统、传统制度、党的路线之类……”<sup>1</sup>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进入了耶稣会之后，不得不放弃诗歌，“因其与神召无关”<sup>2</sup>。使想象服从于宗教正统，在许多情况下，这恰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统对作家所提出的要求。

对这种废止创造力的事例，我们深感震惊。可是，事情并不会如此简单。不是每位与政治有关联的小说家都会交出幻想，换得雇佣文人的紧身衣。还有一种情况，作家在亲身经历政治时，其想象力被真正激发，从而完全投入到政治的精神中。也许政治并不是拜伦的自由选择。社会动荡、剧变的彼时彼地，

---

1 希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 Faber & Faber, 1988），第96页。

2 引自作者笔记，原出处不详。

这种情况其实是难以逃脱的。社会震荡、大厦倾塌，作家深知旧秩序的邪恶、冷漠或贪婪，创作的精神自然地倾向新生命。作家因感动而成为一种新秩序构造表现方式，这个秩序基于人们的相互信任，这是人类自由的进步，因此会释放出更大的创造力。

“俄国成了夜莺的花园，诗人空前活跃。人们几乎没有力量活下去，但是却能够歌唱”<sup>1</sup>——安德烈·别雷在俄国革命初期这样写道。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作者彼得·列维指出，因刻画幻想破灭的《日瓦戈医生》一书，帕斯捷尔纳克在西方被广泛看作是一位反共的俄语作家，但是在作家的青年时代，他曾就当时的混战大唱赞歌。在献给斯大林的诗中，他这样写道：

我们要荣耀，  
我们要看见无畏，  
不做漂亮的花花公子，  
匆匆挥霍掉短暂的一生，  
我们渴望共同劳作，  
遵守共同的律典。<sup>2</sup>

借着种种虚构的形式，作家表达着寻求与政治之间恰当联系的渴望。经历了帕斯捷尔纳克事件的苏联人，却在之后的不

---

1 彼得·列维(Peter Levi)在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 Hutchinson, 1990)中引用别雷的话,第142页。

2 叶夫根尼·帕斯捷尔纳克(Evgeny Pasternak)在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悲惨年代1930—1960》(Boris Pasternak: The Tragic Years 1930-60, Collins Harvill, 1990)中所引,第38页。

同背景下,受到当代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的无情嘲讽:“一种对自由的真诚但扭曲的热情(使之)沦为机械奴隶。罪即在此。”<sup>1</sup>到了20世纪30年代,高尚的热情悲剧性地变得残旧不堪,作家协会全力开动也只能写出平庸的陈词滥调,以致逼得马雅可夫斯基自杀,让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一个立身之处的祈望落空。他住在房间的一个小隔间里,在忍饥挨冻中写作。然而,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放弃信仰——对革命的高尚的初衷。托洛茨基问他,为什么他放弃以社会为主题,他写信给朋友说:“我告诉他,《生活啊,我的姐妹》(他那时刚出版的书)的主题完全是革命的。革命的过程最接近核心:革命的黎明,革命在其让人回归本性、从天赋人权的角度看事情之际爆发。”<sup>2</sup>可是,在帕斯捷尔纳克看来,根据国家以及作家协会的法令,这个时期的写作是一列出轨的列车,已经翻进了谷底。采用这种描述,体现了作者绝望的潜在判断:他自身以及作家同行的创作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在他的年代,列车经常在他的作品里出现,也许仅仅一掠而过,却象征着作者要捕捉的生活的意义。

叶芝说历史的重要关头有一种“可怕的美丽”,人们寻找新秩序,“使人回归本性,一种天赋权利的状态”,而这并非使政治成为虚构的杀手。布莱希特和聂鲁达持着这样的观念而得以存活。但是,像所有重要的关系一样,这种关系总带有它的危险性。那令人沮丧的最初发现再次被马格里斯的嘲讽完美地表达

---

1 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剑的推论》(*Inferences from a Sabre*, Polygon, 1990)。

2 彼得·列维在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中引用,第100页。

出来：“谎言相当逼真，几乎同真理一样，它影响、改变了世界。”<sup>1</sup>而小说家追求的真理不止于表面的论理，他们相信真理不论多么扑朔迷离，都是唯一的真实。可是我们目睹过谎言的转变，我们经历过戈培尔<sup>2</sup>，而他在国际上的继承者们在数个国家对人们施行这种谎言的转变，这些继承者中就包括我的国家中的白人。这些人认同这一谎言——种族隔离既是神圣的律法，又代表尘世的公正，并以此为戒律创建社会。

要注意，改变世界的谎言让艺术承担起巨大的责任，艺术要以自身的改变来抵制谎言。作家探求的知识和他们本身的直觉，都与谎言相悖。

我们翻阅人的面孔  
我们解读人的目光……  
付出生命才得如此<sup>3</sup>

——南非诗人蒙加纳·瓦利·塞若特如是说。我们可以拒绝写作服从一切正统，我们可以拒绝走一切政党路线，即使那是我们所知的正义事业或我们自己所要求的；但是，我们不能拒绝已知责任。我们所知表象之下的真实，应当成为塞若特所说的，“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必须在这种无法避免的与政治的关

---

1 马格里斯：《剑的推论》，第43页。

2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 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宣传部部长。——编注

3 蒙加纳·瓦利·塞若特（Mongane Wally Serote）：《艰难的故事》（*A Tough Tale*, Kluetown Books, 1987），第7页。

系中,在沉沉黑夜中寻找智慧”<sup>1</sup>。

最根本的最容易辨识的沉沉黑夜,指的是政治引导的审查。在一些国家,没有作家入狱,没有作品被禁,审查程度极低,且会有公开的法律制约;但是,谎言的力量仍然在影响这些国家的作家。奥威尔曾警告我们,歪曲词语将暗暗地毁坏真理。1984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人们更会记得《动物庄园》那有趣的动画片,而忘记歪曲语言的寓意深远的警告。哈罗德·品特最近说到语言核心的一种病症:“使语言成为永远的伪装,用谎言编织的挂毯。人类决然的、无所顾忌的损毁与堕落遍及身心……腐败的权力用粉饰的言辞、枯燥的术语对之加以辩护。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仔细研究过自己所用的语言?这是我们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吗?……真实是否在语言之外,在一旁冷眼相向、讳莫如深?真实和我们的知觉之间是否具有精确且关键的一致性?或者,我们是否只为了故意模糊和歪曲事实而使用语言——歪曲是非和事情的**真伪**——因为我们害怕它?我认为,正是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使我们自己落入这样的陷阱:自由、民主、基督教价值观,仍然被用来维护野蛮、可耻的政策和行为。”<sup>2</sup>

如果对作家来说,真实仍在语言之外,那么他们就完全无须成为作家。小说家应当追寻真实与认识之间精确且关键的一致性,发掘词语的真正含义,表达出“事物的不同状态”,摈弃政治

---

1 同前。

2 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1990年3月31日在英国广播节目《观点》(Opinion)中所录。